

国企布局的扩与缩 03 黄范章: 国资管理可用“多层次”架构 04 刘纪鹏: 构建大国资委监管体系 05
京沪高铁: 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05 8亿元碳费逼航空企业变阵 06 天津“最牛烂尾楼”纠纷调查 07

王忠禹出席第100届国际劳工大会并发言强调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做到企业员工共同成长



【特约记者尚晓明日内瓦报道】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会长王忠禹6月13日在瑞士日内瓦出席第100届国际劳工大会并发言。王忠禹指出,90多年来,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遵循其独特的三方性原则,与各成员国政府、工会和雇主组织密切合作,在推动就业、保护劳动者权益、稳定劳动关系、促进社会正义和公平全球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企业联合会作为中国的雇主组织和企业组织代表,将按照科学发展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决策部署,继续努力促进经济持续增长,千方百计扩大就业,保障员工权益,发展和谐劳动关系,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做到企业与员工共同成长。

关系,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做到企业与员工共同成长。

第100届国际劳工大会于6月1日至17日在瑞士日内瓦万国宫召开。本届大会的主题是“创建一个体面劳动的未来”,除讨论相关技术性议题外,还举办系列庆祝活动。俄罗斯总理普京、德国总理默克尔、芬兰总统哈洛宁、印度尼西亚总统苏西洛等多个成员国政府首脑和政要出席大会并发言。我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副部长王晓初,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一副主席王玉普,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执行副会长陈兰通出席大会。

发展和谐劳动关系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会长 王忠禹

本届大会是国际劳工组织1919年成立以来的第100届会议。九十多年来,国际劳工组织按照章程和费城宣言的宗旨,遵循其独特的三方性原则,与各成员国政府、工会和雇主组织密切合作,在推动就业、保护劳动者权益、稳定劳动关系、促进社会正义和公平全球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今年总干事向大会提交的《社会正义新时代》报告,提出为了实现一个更具社会正义的新时代,我们需要创造更有效率的发展模式。报告分析了以往低效率的发展模式给劳工世界带来的许多问题,包括失业率居高不下、收入不平等及缺乏社会保护等,呼吁成员国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通过实施国际劳工标准和推动体面劳动议程等措施,促进社会正义的实现。报告鼓励各成员国继续实施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创造更多就业岗位,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我们赞赏总干事把创造一个更具效率的发展模式作为目标提出来,并通过国际社会的通力合作,来实现更具效率的发展。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和社会进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我们也清醒认识到,中国人口多、底子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水平还很低,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需要继续付出艰苦努力。今年是中国实施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开局之年,中国制定颁布了“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加快推进经济

结构调整,不断深化改革开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纲要》提出了今后五年要努力实现“双同步”,即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还进一步明确提出健全协调劳动关系三方机制,建立规范有序、公正合理、互利共赢、和谐稳定劳动关系的目标任务。这些目标的实现,将在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中,逐步展现出来。

回顾国际劳工大会100届的不平凡历程,在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历史时刻,我们深深感到经济增长和持续发展对消除贫困、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至关重要。企业是经济发展的主体,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石。中国企业联合会作为中国的雇主组织和企业组织代表,将继续努力促进经济持续增长,千方百计扩大就业,保障员工权益,发展和谐劳动关系,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做到企业与员工共同成长。

各位代表,实现社会正义的目标,创造更有效率的发展模式,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企业和企业家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我们呼吁国际社会和国际劳工组织关心和支持企业家,为企业持续发展提供有利条件。中国企业联合会将一如既往,进一步加强与国际劳工组织和各国雇主组织的交流与合作,更好地为企业、企业家服务,共同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本文为王忠禹6月13日在日内瓦万国宫第100届国际劳工大会上的发言,发表时略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

编者按

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的时候,我们推出“中国国企改革与发展”系列报道。整个报道分为10期,每期约四个版。今天发表的第一个专题,以中国国企改革与发展方向为主要内容。

每一项改革都有不可复制的独特性,而国企改革却是极富传奇色彩的焦点。中国国企由2/3亏损到全面复苏与崛起,是迈入21世纪后中国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之一,因为不同于西方的发展模式,又“激发了世界关于制度的丰富想象”。在进入攻坚克难的关键时期,如果我们善于从国企改革与发展历史的遭遇中汲取智慧,于持续的变局中探寻那些隐藏在表象下面的变革力量,以更大的视野认识这一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那么我们对当下社会有关国企的一些非议就不会感到突兀和茫然。

现在,我们将中国国企改革与发展分为一个断面呈现出来,让人们看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国企是怎样摆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艰难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我们相信,这有利于读者深化对国企改革与发展的认识,增强做强做优国企的信心。

国企改革的历史方位与现实难题

■本报评论员 李锦田 田晶/文

国企是什么?国企改革走的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

这两个看似简单的问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引人注目,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处于备受争议的境地。

国有企业几乎总在受批评:不赚钱以至亏损的时候,批评它经营不善,缺乏效率;赚了钱甚至赚很多,则批评它是“与民争利”,或者是国家在输送利益。如果它要做大,批评它是垄断;如果它做不大,则批评说国有企业没有竞争力。

国有企业自己似乎也在抱怨:我们在做大做强,给国家积聚这么多的资产,缴了这么多的税,还总是受到舆论批评。“又要马儿跑得好,还要马儿少吃草。”

从更大更远的历史时空坐标系中来理解、体察、洞悉国企改革的过程及其生存的环境,我们便可以对国企多一分理解,多一份宽容。

过去的国企怎么样?现在的国企怎么样?对此条分缕析,我们不难得出正确的结论。

国企从哪里来?国企到哪里去?对此追溯渊源,有助于我们判断其所承担的历史任务。

国企面临的困难与种种误解,缘于经济体制的二元结构;国企改革的目标是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现代企业制度。国企改革的任务是进行国有经济战略布局调整,实现公有制经济与市场的有机结合,这是中国企业改革的实质所在、特色所在、经验所在,也是难点所在。

这就是我们寻求国企所处的历史方位得出的结论。

从“国营”、“国有”到“国资”,主题词三次变化展示国企改革的历史趋势

国有企业,指国家的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投资参与控制的企业。在2000年前的中国,在《盐铁论》中就已经有论及国家对重要产业“建本抑末”的记述。

如哲人所说:“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追踪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30年历程,一条主线清晰地呈现出来。

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第一阶段是1978年12月至1992年9月,重点是放权让利。

1978年改革开放伊始,中国没有一家可称为现代意义上的企业。时任福建省经委副主任、现任福建省企联会长的黄文麟告诉记者,上世纪80年代初,国企统得过死的弊端已暴露无遗,计划经济体制紧紧捆住了企业的手脚。企业利润全部上缴,需要花钱向国家申请,甚至连个厕所都要主管部门审批。

1984年春天,受中日合资企业福日电视机厂经营的启发,福建省55位厂长、经理一起写信,向上级领导“要权”,请求“松绑”。所谓“松绑放权”,意味着打破计划经济时代的国企行政化。黄文麟起草的这封信,很快被送到时任福建省委书记项南的案头。第二天,《福建日报》头版头条全文刊登。一个星期后,《人民日报》报道福建厂长经理们呼吁“松绑放权”的消息。

改革之始,以党中央、国务院作出

的历次重大决定为主要标志和动力,国有企业改革从深度和广度上不断推进。不久,国务院正式发布《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松绑放权”行动开始全面落实。

经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颁布《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到股份制改革正式试点,再到1986年国务院发文全面推行《厂长经理负责制》,这一阶段,在保持国家所有权的前提下,可以将企业的经营权下放给企业。

正是沿着这样的改革思路,国企开始探索多种形式的经营责任制,以首都钢铁公司为代表的承包经营责任制被大多数企业所认同和效仿,风靡一时。

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国企改革进入制度创新和结构调整的第二阶段。1993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国企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并且将现代企业制度概括为16个字:“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从1994年起,2500多家企业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进行试点。

1995年9月,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要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抓好大的,放活小的,即“抓大放小”。紧接着,是1998年到2000年国企改革脱困攻坚的3年战役。从当时的报道可见那时国企的惨淡面相:1998年,2/3以上国有企业亏损,在国家统计局工业司统计的5.8万户国有企业中,全部国有企业亏损额比上年增长23%,其中有大型国有企业增长30.4%。救国企于濒死,成为上个世纪末最为引人注目的话题。国企改革,对当时的政府来说,是“最难啃的骨头”。

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来考虑和实施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路得到了我国最高决策部门的认可。1999年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并调整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指导思想,实际操作过程表现出的是国有经济从小企业层面全面退出。

2003年,进入以国有资产监督管理体制改革推动国企改革发展阶段,标志着国企改革第三阶段的启程。中央、省、市(地)三级国有资产监管机构相继组建,《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等法规规章相继出台。国资委的成立初步实现了出资人职能的一体化和集中化,隔开了其他政府部门对企业的直接干预。最重要的一点是,在政府的层面责任清晰了。

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创新,进一步激发了企业改革的活力。“兼并重组”、“整合”取代“拆分”、“消除垄断”成为国企改革的主题词。

国有资本逐步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诸如石油石化、电力、国防、通信、运输、冶金、机械等行业集中。一批长期亏损、资不抵债和资源枯竭的国有企业通过政策性关闭破产退出市场。

随着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的推进,央企股份制改革取得了明显进展。到“十一五”末,央企公司制企业所占比重已达70%,一批大型国企先后在境内外资本市场上市。目前央企资产总额的52.88%、净资产的68.05%、营业收入的59.65%都在上市公司。

宝钢集团率先建立董事会试点,这一事件被称为“国资委成立后最大的新闻”。目前,已有32家央企开展了建立和完善规范的董事会工作,外部董事占半

数以上。

中国国企从国资委建立,一路走到今日,所取得的成就如斯璀璨!

2002年到2010年间,国资委所管辖的央企由236家减少到123家。数量在减少,总量却在不断扩大,综合实力、影响力、控制力大大增强。

央企资产总额从7.13万亿元增长到24.3万亿元,向着做大的方向不断挺进。

营业收入从3.36万亿元增加到16.69万亿元,开源创收,增强自身实力。

实现利润从2405.5亿元增加到11315亿元,真正实现了自身的价值。上缴税金从2914.8亿元增加到超过1.4万亿元,为国家财政贡献出巨大的力量。

有人记得,直到1994年,中国最大的500家国有企业全年销售收入的总和,还不如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一家的销售收入。而2010年美国《财富》杂志公布的世界500强中,国资委监管的中央企业有30家,比2005年增加20家,中国石化、国家电网、中国石油进入前十强。(下转第二版)

